

凡 例

一、编印本选辑的目的在于保存和积累历史资料，并推动撰写资料工作的开展。所选资料大部份是作者的亲身经历或见闻，有一定的史料价值。但所述史料可能不尽翔实，观点可能不完全正确，仅供研究历史和地方文献者的参考。

二、本选辑所选资料，包括从清末到“文化大革命”以前的历史的各个方面，不拘文体，只要有史料价值，即予选入。

三、本选辑所编印的资料，欢迎阅者提出质疑、补充和订正。

四、本选辑对来稿可加以摘录、删节和文字上的修改。

目 录

郭士杰烈士事略·····	张隐秋	1
陈进思烈士事略·····	郑嘉福 吕振修	3
辛亥隆昌反正前后散记·····	<u>吴荫秋</u>	7
隆昌国民党人争权夺利情况·····	<u>吴荫秋</u>	12
一九二四年隆昌人民抗捐回忆录 ·····	邓介人 赵嘉祺整理	25
民国十一年五月初一发生在界市场的一次 洗劫烧杀·····	程尊汉	38
建国前隆昌教育界的川大帮·····	郑嘉福	48
建国前隆昌教育界的成都高师帮·····	<u>冯金德</u>	53
建国前隆昌中学校长逐鹿记·····	<u>周昌发</u>	58
我办隆昌县立中学的回忆·····	<u>冯金德</u>	65
私立兴国中学简史·····	韩允之	72
建国前隆昌商会情况·····	曾令文	76
隆昌土陶业·····	袁良吉	81
建国前隆昌的酿酒业·····	万国风 李攀云	85
建国前隆昌县境内公路交通概况·····	本会整理	87
建国前隆昌猪鬃收购和运销概况·····	<u>吴荫秋</u>	91
建国前的隆昌官茶店·····	范荣贵	94

建国前隆昌的几家公司行号·····	梁鉴尧 罗秉五	97
国民党中统在四川活动情况·····	蓝克诚	100
青年党党魁曾琦·····	沈涵春	104
建国前后青年党在隆昌的罪恶活动·····	本会整理	107

郭士杰烈士事略

张隐秋

烈士为云顶寨封建家族郭氏之苗裔，状貌魁伟，美风仪，性刚毅，善辞令，少有大志。其祖书池，为清甲午科举人，湖北督粮道。父文彪，曾任运输处长、军需官等。烈士生于一九〇六年，为清光绪之末，时清廷置外侮民艰于不顾，因循苟且，日趋危亡，郭族则履厚席丰，骄纵横恣，烈士生于斯，长于斯，过声色利欲腐朽豪华之生活于斯，但烈士时尚幼弱，不自知也。

烈士稍长，见族人外表规矩井然，貌似宽厚，而实则口蜜腹剑，盘剥压榨，贪得利己，斗角勾心之事几无已时，乃厌而自耻，忿恚离家，随堂兄坚白求学于安徽，摒绝纨绔，粗食励行，作工助读，与剥削之家隔绝。

当时民国不振，外强侵入几无宁岁，民不聊生，国事糜烂，有志者皆大声疾呼，号召御敌。烈士素抱拯民水火，富强祖国之志，乃于一九二四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从此投身革命，置生死于度外，为党工作，历尽困难，任安庆地委书记，与柯庆施单线联系。曾三次被捕，一次芜湖，一次安庆，均得脱险。随后，党令其潜由武汉到上海，入黄埔军校，路经汉口，暂办党务，时郭坚白为武大教授，得消息知烈士又将被

捕，乃连夜奔告，再三主张其立随己避往他所，为彼集款西渡，赴法留学。烈士因未通知上下级、未处置机关及文件等，以一人之生命事小，全党之损失事大，遂拒而不听。坚白流泪而行，及送别楼下，已有形迹可疑之人踽踽街侧。坚白再逼其同行，烈士终不许，挥手登楼，即挂电话，转机关，置信号，焚文件，未毕，梯声咯咯，隐以未尽稿吞之，而特务已破扉拥入矣。烈士被捕，昂首入狱，毫无惧容，岸然指斥旧司法及国民政府之腐化贪污、危害人民于公众之堂，虽严刑拷讯，利诱相乘，但烈士终不屈服。折磨半年，骨立形销，而精神爽朗，每在狱中乘遇即宣扬共产主义，唤起人民。党及亲友皆百计营救，终于一九二七年被密害于汉口，时年二十有一，此党及人民之损失也。

烈士牺牲二十二年后，全国解放，人民政府乃寻其父母弟妹于云顶之麓，迎养其父母终天年，安置其弟妹之工作。弟一，字靖侯，工作于重庆百货公司，今已故。妹三：长福瑛，服务保险公司；次舜颜，失明，为宝鸡盲哑医院按摩医生；季择生，工作于西南电力局，均已退休。

一九五一年，皖北合肥行政公署来信询问郭士杰烈士亲人，同年开追悼会。烈士生年虽暂，然光明磊落，为党前驱，正气凛然，千秋不灭，乃援笔为之传而赞曰：

峨嵋之精，川南之灵，集于烈士，以信以诚。

烈士之志，党之干城；烈士之名，千古不泯。

陈进思烈士事略

郑嘉福 吕振修

陈进思一名陈忠孝，世居隆昌县城内文庙坝近圣人居（系一小独院，门有砖砌门枋，额题“近圣人居”，以其宅近文庙故也）。他自幼聪颖，深为左右邻舍所喜爱，但家世清贫，仅靠其父作小手工业所得，勉强维持最低生活，贫穷为当时官僚豪绅所鄙贱，对穷人形成一种极不公平的社会压力，这压力深深刺痛了陈进思幼小的心灵，他因而产生了仇视官僚豪绅的概念，这是他一步一步地走上革命道路的思想基础

在本世纪三十年代各军阀直接间接依靠帝国主义，据地自雄，你争我夺，长期内战，横征暴敛，无休止地剥削人民。隆昌是成渝道上有名的战场，饱受兵灾匪祸，哀鸿遍野。当时陈进思读隆昌县中第十班，亲见驻军李毛牛穷凶恶极地在隆昌强征门户捐，残民以逞，隆中老教师余霖三站出来说了几句正义话，几遭杀身之祸；渔箭乡团总被诬夺逃兵枪支，控索赔偿，活活被吊死于兵营，弄得满城风雨，风声鹤唳。陈进思看在眼里，记在心里，在学校进步老师诱导之下，喜欢阅读《史记》项羽本纪、淮阴侯列传、游侠列传、刺客列传，养成其身长不满五尺，而心雄万夫的气概，遂怀有改造旧世界之想法。

一九二四年四月某夜有一投考广东黄埔军校的青年路过隆昌，来校投宿，青年人遇青年人，心投意合，大谈革命前程，

大摆国家大事，大骂军阀万恶，翌晨登程而别。校中两位监学意见各有不同，一个出自关心青年，同意留宿，一个以同学私自留宿外宾，违犯学校规章，互相争吵，大有欲加罪于学生之势。风华正茂的广大学生对后者大为不满，遂掀起“择师”运动，并走出学校游行示威，罢课三天。隆昌县知事徐其特赶到学校召集学生训话，竟向学生宣布愿读者就读，不愿读者就走。全校学生面面相觑，默默无言，莫敢表态，惟陈进思、马道宣挺身而出，举起右手高喊“我不愿读”。二人相率退堂，学校校长及徐知事均怒目面视，无可奈何地说：“英雄！英雄！”全校二百余学生的叹息声、讥讽声、赞扬声、笑骂声混在一起，拥出教室。随后马道宣考入合川刘伯承办的教导队，并参加了顺泸起义；陈进思转入省立成都第一中学读书，在党的领导下，积极投入“反劣币”和“争取教育经费独立”等运动。

一九二六年，四川军阀暗中与国民党右派（西山派）合谋，刘湘、刘文辉、杨森、田頌尧、邓锡侯等打出革命旗帜，而暗中与蒋介石勾结，大搞反革命活动。中共川西特委会领导成都大学的社会科学社、成都师范大学的导社、公立四川大学法政专门的锐社、四川省第一师范学校的赤峰社、师大附中的新青年、成都省立第一中学的石屏社及朝阳嚶嚶社等，与成都的反动势力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当时成都乃至全省军阀各各扩充势力，竞相开厂私造银币铜币，直接受其剥削的广大劳动人民，呻吟于刀俎之上，旦夕莫保，教育经费亦大受影响。加以各军阀截留应拨的教育经费而不拨，使各校连七折八扣的微薄工薪都不能按月发送，师生叫苦，学校几至关门。

中共川西特委会遂领导全市学生进行“反劣币”运动、

“争取成都教育经费独立”运动，陈进思为省一中石屏社核心人物，他积极组织同学罢课游行，还要走出校外指导工人罢工示威，他们在炉火正红的高潮中，揪出四川省教育厅长万克明及省一中校长等游街示众。省一中校长在学生压力下辞职潜逃后，教厅委第二十四军秘书、国民党右派杨廷全为校长，杨率领武装强行接收学校行政，马上挂牌开除学校石屏社主要成员陈进思等多人。一九二八年二月十二日晨陈进思乘学校撤走了武装，率领同学多人质问杨廷全，人多势大，遂点燃革命火炬，打死了杨廷全，中共川西特委刘披云（解放后任川南行政公署副主任）当即派人护送陈进思出省，行至万县为四川军阀王陵基所杀，光荣牺牲。接着成都军阀为扑灭革命烈火，制造了骇人听闻的二十年代的“二·一六”惨案。

一九二八年二月十六日，成都三军联合办事处，在黎明前举行成都大逮捕，荷枪实弹包围各赤色学生团体所在各校，逮捕了百余人，当天捆绑袁诗尧老师和张博诗、郭选棠、龚堪慎、白贞瑞、周尚明、陈选、钱方祥、王道文、王向忠、韩宗琳、李正恩、胡景媛、石邦桀等青年学生共十四名沿街游行，烈士们雄赳赳、气昂昂沿途高呼“工农兵联合起来！”“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游至莲花池刑场，都慷慨就义，尸横大地，血沃黄沙，环观者莫不泪流满面，泣不成声，默默记住那些军阀欠下人民的这一笔大血债。查所谓罪状，根据成都国民党市党部转省一中函称：“一中校长杨廷全被殴身亡，系省一中石屏社学生，纠结成大社会科学研究社、成都师大导社、附中新青年、政法共进社、省师赤峰社一切反动份子所为。”既未进行审问、又无供词证据，尤为荒唐的是，所牺牲的十四烈士中，石屏社竟无一人，均为他校学生。这样罗织成

罪，草菅人命，捕风捉影，以快一己之私，天乎天乎！理在何地？不仅如此，他们还继续通缉十二名学生归案就戮，计有：陈进思、冉崇雁、彭文伯、陈历年、张德楷、陈德才、苟永芬、李清玉、周国昌、欧阳芬、吴启芬、苟发柯等。当时隆昌县府奉令后，即时派出军警在城乡、特别在文庙坝前后左右捉拿陈进思，及至确知陈进思已被王陵基所杀，才结案了事。

陈进思在二十年代共产党初期活动中，相信真理，不怕牺牲，首先发难，虽死犹生。他永远活在人民心中，永远活在光辉灿烂的社会主义事业中。

辛亥隆昌反正前后散记

吴蔚秋

一、引 言

满清王朝政治腐败，外侮频仍，亡国之祸，迫在眉睫，孙中山抱救国救民之旨，集合革命志士，在日本成立兴中会，复改为同盟会，最后改为国民党，党员在各地秘密活动，暗杀清庭重要官员，大力鼓吹革命，唤起民众，推翻满清，建立民国。

二、隆昌同盟会

隆昌加入同盟会的人数不少，有黄复生、张烈武、陈伯珩、黄容九、黄肃方、薛瀛海、程泽湘、郑辉武、曾伯恩、文鸿模、喻鸿宾、古则先等。开会多在龙市乡同丰寺，即现在完全小学，全在夜间开会，以点香为记号。

三、隆昌国民党

清光绪末年，各地革命之声，风起云涌，隆昌同盟会奉上级指示，扩大组织，改组为国民党，吸收新党员六十余人，大多是血气方刚，青年有为的知识分子，如程世溪、陈雨时、彭牟亮、李咸之、薛镜光、陈舜五、杨辛武、令狐冰清、薛徽山、黄汉溪、廖廷兰、黄源江、晏剑秋、华友德、吴蔚宗、吴瑞邹、魏九如、李咸有、王次咸、李申之、李锡之、晏和君、薛慎修、吕其峰等。仍作秘密活动，开会多在北街关帝庙隔壁天下利书店，有时在离城一里的朝天寺左侧方黄容九家中。当时的

国民党员多系小资产阶级出身，亦有地主家庭出身及农民家庭出身的青年子弟。

四、天下利书店

光绪32年，隆昌天下利书店，开设于北街关帝庙隔壁，是国民党员秘密集会之所，资本全由国民党员凑合而来，卖的书多系科学书和各种新书，如当时的《醒世钟》，颇风行一时。

《醒世钟》是国民党中央出版的一种定期刊物，一般青年学生和进步人士都爱阅读，《醒世钟》的内容，主要是宣传国民党的主义和政策，并揭发满清政治腐败，极力鼓吹革命，也有小品文和诗歌，都是讽刺满清的作品，致为当局所忌。宣统元年，知事周宜甫派兵查封天下利书店，捉拿负责人黄肃方、郑辉武，黄、郑闻讯逃匿，仅捉到肃方之父黄运三。

五、隆昌同志会

隆昌同志会是响应四川保路同志会组织起来的，辛亥年由张烈武、黄肃方、黄容九、程世溪等发起组织，国民党利用哥老会人多力量大，以大同公、至仁公两面码头为基础，以大同公龙头大爷程世溪为标统，以杨辛武、曾倬三为统领，以郑锡三、蔡北屏、刘玉斋为营长，召集哥老，准备起义。国民党是核心组织，同志会是外围组织，国民党员只有六十余人，同志会人数约八、九百人，高峰乡、龙市乡、富隆乡、石碾乡亦有同志会的组织，每处不过百数十人。

六、隆昌国民党与共和党的斗争

辛亥革命成功后，民国元年孙中山任临时大总统。在任不久，即为封建势力所迫，辞职出国，将临时大总统职务移交袁世凯。袁野心勃勃，想做皇帝，指使心腹组织共和党。隆昌亦有共和党的组织，其最露头角者，为蔡雅南、黄楚翘、黄运

九、郭仁珊、李南轩、郑重等，受省方胡景伊的指挥。国民党、共和党对立，明争暗斗，颇为激烈。共和党蔡雅南、黄楚翘相继任隆昌视学，掌握教育大权，经常指使学生与国民党发生冲突。当时隆昌中学学生年龄颇大，多在20岁左右，有加入国民党者，如吴庶宜、薛君献、吴少皋、袁泽湘等，有加入共和党者，如郑怡桐、郑陶松等，口角斗殴，时有所闻。两党角斗最为激烈的事件，莫如李式之刺杀李南轩：李南轩是李式之的胞叔，因李南轩迫害国民党，李式之恨之入骨，大义灭亲，竟买通“黑巴巴”在南街大灰堆将李南轩刺杀。

七、国民党的失败

辛亥革命成功后，四川有五个师，第一师师长周骏，第二师师长刘存厚，第三师师长钟体道，第四师师长孙泽培，第五师师长熊克武。有两个党，一是国民党，一是共和党。国民党的武装力量是第五师熊克武，共和党的武装力量是第一师周骏及第二师刘存厚。袁世凯利用共和党进攻国民党，对共和党人以利诱，以官诱，结果造成一、二两师与第五师武装斗争，亦即所谓熊、杨起义（熊克武、杨沧白在重庆起义），此民国二年事也。因第五师装备不及一、二两师，熊、杨失败，隆昌共和党蔡雅南等乘机迫害国民党，所有国民党人均被迫出走云南、南洋各地避难，抄家封产，称为乱党，且榜示国民党员名单，行文到各地捉拿。是役也，各地被杀者有之，被逮入狱者，不胜枚举，张烈武、程泽湘被杀于北京，薛瀛海、黄溯初被杀于重庆，李根源被杀于顺庆，黄复生、张巍被逮于上海，黄肃方被逮于北京，关的关，杀的杀，逃的逃，辛亥革命至此一败涂地。

八、国民党东山再起

民国四年，孙中山委蔡松坡为护国军总司令，统率滇黔军赵又新、顾品珍、罗佩金、朱德、金汉鼎、袁祖铭、戴戡等两万人入川，滇黔军久经训练，沉着勇敢善战，头戴红边边军帽，多新式武器，一般都用的日本三八式钩钩枪及俄式枪，虽北洋军阀曹錕带兵入川协助川军作战，但亦经不起滇黔军一击，同时各省均纷纷响应，黄克强起义湖南，段祺瑞誓师马厂，不到一年，即将袁世凯推翻，倒袁成功，熊克武任四川督军，国民党东山再起，隆昌国民党人均纷纷回县，国民党宽大，并未报复共和党，从此共和党解体，国民党又复当权。

九、国民党升官发财贪污腐化

民国六年，黄复生任靖国军第一路总司令兼任川东道尹，隆昌国民党员均纷纷前往依附，有的被委为县长，有的被委为秘书、科长、征收局长、委员等职，所有国民党员及辛亥革命出力人员，论功行赏，只有大官小官的区别，于是川东一带都是隆昌人的势力范围，重庆道尹公署有隆昌帮之称。这些国民党员以为革命已经成功，袁世凯已经打倒，大都穷奢极欲，醉生梦死，贪污腐化，尽量享乐，黄复生解职后，隆昌国民党员莫不囊括金银满载而归，辛亥革命之精神，至此已经变质，足见小资产阶级旧民主革命的不彻底，隆昌如是，全川何尝不如是，全国又何尝不如是，故孙中山又提出“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及“仔细敌人软化你”的口号，良可慨矣！

十、附 记

辛亥革命我才十岁，在高等小学读书，我的父亲吴蔚宗和叔父吴瑞邹都是国民党员，因此我知道很多革命事迹。我曾替国民党带过路，送过信。民国二年，袁世凯捉拿党人时，我已

十二岁，有一次李式之、彭牟亮、吴蔚宗三人在黄容九家中开会出来，准备当晚到内江，但须经过禹王宫，禹王宫驻有警备队，设有盘查哨，他们不敢从大路去，必须走小路绕过禹王宫才行，这条小路是从蛮子沱走观音桥经过石栏杆至铃铃牌坊合到内江的大路，这条小路是我儿时钓游之路，我很熟悉，所以他们要找我带路。民国17年黄复生在我家住了一月有余，黄吃鸦片，我也吃鸦片，经常在烟盘子上谈天。黄肃方、黄容九又经常来要，在烟瘾过足的闲谈当中，我又听得更多关于辛亥革命的故事。最近访问郑林华（郑辉武之子），又得了一部分材料，故以上所述，全由我回忆及访问而来，挂一漏万，在所不免，尤其是时间一项，事隔四、五十年，难免不有差前错后之处，希望最悉隆昌辛亥革命人士，予以指正。

一九六四年三月二十六日遗稿

隆昌国民党人争权夺利情况

吴荫秋

一、国民党隆昌县党部工作概况

辛亥前隆昌国民党员只有六十余人，均作秘密活动，曾创办天下利书店，作为宣传及集会之处。辛亥革命成功后，民国元年国民党只有党长，并无县党部之组织，所有党员均外出作官，醉心名利，党务工作无任何活动可言。一般党员以为革命已经成功，醉生梦死、尽量享乐。一直到民国十三年，孙中山提出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改组国民党，隆昌奉命成立县党部于衙前街红十字会内。民国十六年北伐成功，国民政府通令各县正式成立县党部，接收议参会所有经费档案，从此党费有着，委员有薪，办事有人，不似过去党员养党，负责无人，但所办之事，亦不过例行公文而已。县党部是民意机关，其实何能代表民意，当时县党部委员有党官之称，足见脱离群众之远。

民国十七年改组县党部，设立秘书处、组织部、训练部、宣传部。当时县党部经常的工作是偏重在宣传方面，每遇纪念日即号召中小学教师、学生及机关法团举行集会，参加游行，沿街讲演，高呼口号，散发传单，张贴标语，徒具形式而已。

民国二十年“九、一八”事变日本出兵进佔津阳，中央军

节节退让，抱不抵抗主义，惟黑龙江省主席马占山奋起抗战，颇得人心，全国响应，无不支持，函电交加，汇款接济，隆昌亦不例外，县党部曾组织隆昌县抗日救国大会，募集捐款一千余元，棉衣数百套，寄与马占山，并又成立隆昌肃清仇货委员会，登记日货，拍卖日货，但商人仅拿少数日货出来登记，多数日货却暗中运往别方出售，甚至仍有在上海购买日货，换牌运回隆昌，以图厚利者，如张聚荣的和记，即在上海进货，而“马口”很紧，上海、重庆海关检查很严，虽换牌名，内行也可检查出来，当时民气高涨，敌忾同仇，人民群众与学校学生监视尤严。各帝国主义与中国订有不平等条约，日本在中国取得有内河航行权，日本兵轮、商船在长江横冲直撞，毫无顾忌，中国抗日救国会即发出命令，中国人不准赶日本船，不准交商货给日本船运，不准买日本货，原存日货登记拍卖，此种消极抵抗，也很见效，日本船竟无人赶。随后日本想出办法，凡赶日本船的人不收钱，还送一把东洋伞，于是有少数败类腆颜去赶，但在下船时，即有抗日救国会派出的学生，手持写成的纸方，有“亡国奴”、“卖国贼”、“汉奸”等字样，用胶水贴在赶船人的背上。在这种紧急情况下，张聚荣和记的仇货，竟安然运回隆昌，足见商人之狡猾。一说张的仇货系偷关而过，在泸县小市起岸运隆，一说张用钱打通关节，贿通上海、重庆海关放行，因那时重庆抗日救国会确有人“抬包袱”的事，报纸上也常有记载。

民国二十一年县党部职员曾在衙前街一个旅馆内查获一个日本间谍，姓金，是韩国人。在他手提包夹壁里查出一张四川地图，很小、很精致，上面记载很确实，比如永川茶店场到大安场是十五华里，而我们自己制的地图却写成二十华里，又如

隆昌石燕桥到李市乡是十五华里，而我们自己的地图也写成二十华里，金某的地图上两处都写的是十五华里，足见中国自制的地图，还不及日本人所制的地图确实可靠。据说那时中国需要的很多文献，还要到日本去查，真可发一笑！另外还检查得有一册日记本，里面关于各地物产、气候、山脉、河流记载颇详，比如记隆昌的物产，便有夏布、猪鬃、水稻、煤炭，连产麻的地方、花色、品种、价值以及山西帮、陕西帮在隆昌买、运、销情况，都有记载，可惜这个记载没有抄录下来，如果抄录有案，大可供我们现在写夏布历史资料作参考。

民国二十六年县党部曾奉命办理政治训练班，分成三个中队，第一中队设在县党部，第二中队设在西南镇公所，第三中队设在东北镇公所，由县党部职员兼任教育，规定为三个月毕业，有政治课程及军事课程，如三民主义、五权宪法、政治常识、步兵操典等，每个中队约有学生百人左右，学生多系商家店员或手工业学徒与失业青年，办了一期，因受经费限制，即行停办。

隆昌县党部曾办理过四次党员登记，在民国十七年登记有党员二百余人，第二次在民国二十五年登记有党员五百余人，第三次于民国二十八年登记有党员一千余人，第四次是一九四八年上半年的大登记。登记手续是每人填表一式三张，贴三张像片，表内有问答题，如关于三民主义、五权宪法及民主集权制的解释等，存一张在县党部，报一张到省党部，报一张到中央党部，中央党部即根据表内按语发给党证，这些党员多系中小学教师及机关职员，有少数商人，并无工人、农民，当时虽有工会及农会之组织，但工会没有一个真正的工人，农会没有一个真正的农民，平时党务工作，也仅限于县党部这一环，